



结构与变迁

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机遇
与认同意识

高 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结构与变迁

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机遇
与认同意识

高 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与变迁：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机遇与认同意识 / 高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
ISBN 978 - 7 - 5161 - 7980 - 2

I. ①结… II. ①高… III. ①社会结构—研究—中国 IV. ①D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84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孙 萍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社会变迁的张力与谜题	(1)
第二节 追溯变迁的结构动因	(4)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内容	(8)
第二章 研究策略与视角偏好	(12)
第一节 结构论视角的进一步延伸	(12)
第二节 数据描述和推衍的策略方法	(20)
第三节 数据集与分析策略的具体说明	(24)
第三章 社会樊篱的格局变动	(27)
第一节 问题:个体历程流动与社会格局变动的 动态关系	(27)
第二节 社会流动理论的发展脉络	(30)
第三节 樊篱流动假设的提出	(41)
第四节 对樊篱流动假设的模型检验	(50)
第五节 代际收入关联与社会樊篱	(61)
第六节 结语: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关系演变	(71)
第四章 地位认同的参照系转换	(75)
第一节 问题:主观认同与客观要素之间的 联结机制	(75)

第二节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	(78)
第三节	地位层级认同的群际比较	(82)
第四节	地位层级认同的影响因素	(86)
第五节	参照系的转换	(93)
第六节	结语:中层认同的前提	(101)
第五章	教育获得差异的机制变迁	(106)
第一节	问题:不同阶段的升学决策与制度 安排的关系	(106)
第二节	不同阶段教育的扩展过程	(116)
第三节	教育获得差异的不同测度	(124)
第四节	不同教育阶段户籍差异的变化趋势	(130)
第五节	不同教育阶段中户籍的不同意蕴	(144)
第六节	结语:教育获得差异的机制与 教育不平等感	(148)
第六章	参与行为的驱动机制转变	(151)
第一节	问题: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151)
第二节	吸纳式参与和关切式参与	(161)
第三节	参与行为和政府信任的基本情况	(168)
第四节	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辨析	(178)
第五节	利益受损感的影响	(187)
第六节	结语:参与行为与公民性建构	(194)
第七章	社会可持续性的指标建构	(200)
第一节	社会可持续性与社会的结构性张力	(200)
第二节	社会可持续性的四个维度	(202)
第三节	指标框架及操作化	(205)
第四节	各维度内部的几个特点	(209)
第五节	社会可持续性的年度比较	(212)
第六节	社会可持续性的地区比较	(213)

第八章 结语	(218)
第一节 反思:结构与行动	(218)
第二节 讨论:结构与民情	(221)
第三节 不足:能动与机制	(224)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43)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社会变迁的张力与谜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宏观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接近 10%；微观来看，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许多研究致力于寻找这种高速增长背后的支撑因素，即所谓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谜。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开始关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有着生态维度上的考虑，同时也应当包括社会维度上的考虑。在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中，社会可持续性已经和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①。关于社会可持续性，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研究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前提。在这种思路看来，经济发展仍然是发展的主要目标，持续的对象仍然是经济发展本身，社会因素是确保达到这种持续增

^① Colantonio, Andrea, 2007,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Its Definition, Assessment Methods" Working Paper. Oxford: Oxford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 T. F., 2010, "The Core Concept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Can We Cut the Gordian Kno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6 (2).

长的手段或条件。另一种思路是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张力,社会生活本身的持续运行就有赖于对这些结构因素的妥善维系。在这种思路看来,要确保持续的对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社会支撑条件。这是旨趣有异的两种思路,虽然它们在具体研究对象上有所交叉。许多研究者关注到,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却相对滞后和不足,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医疗保障体系落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环境持续恶化等。这些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会威胁到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除此之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基本的社会支撑条件,如社会流动的平台、机会公平的保障、地位认同的稳定、参与活力的调动等。这些条件可以类比为发展进程中社会层面上的基础设施,既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发展本身所应包含的内容。这些社会支撑条件的走向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并不是并行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的激励不仅来自物质激励,如收入和福利的提升,而且也来自社会身份的尊重和认同。只有物质激励没有身份的认同,发展能力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身份认同没有物质福利的提升,也谈不到持久的发展。主观地位认同的相对平衡和稳定,应是发展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前提。再如,虽然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伴随经济发展,社会的流动性也将会增强,但是经验调查数据却对此提出了质疑。社会流动性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受到社会结构格局和具体制度安排的影响而呈现出复杂的走向。如果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流动格局日益走向封闭,社会樊篱强化,那么发展进程也将是不可持续的。上述现象提示我们需要去认真分析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出现了某些从既有解释来看很难理解的特点与“悖论”,尤其是在人们的生活机遇格局与身份认同意识上。例如,我们很难对于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整体变动方向进行判断,认为其变得更为开放还是更为封闭,在某些流动樊篱变得松弛的同时,可能其他某些流动樊篱

在变得致密。再如,从社会层级认同来看,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教育水平与预期寿命也在上升,如果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来测量,社会发展水平是稳步提升的,但是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却不仅与西方社会相比呈现出相对偏低的特点,而且甚至在某些时间段中呈现出向下偏移的态势。^①从教育获得来看,总体而言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差异与阶层差异都有所缩小,人们获取教育资源的机会得到普遍提升,但与此同时,对于优质教育机会的竞争却更为激烈,人们的教育不公平感更为强烈。^②从社会参与来看,虽然“公众参与”已经被纳入社会管理新格局的表述中,人们也预期中产阶级将会成为公民性生长的重要基础,然而很多社会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仍然不足。^③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展现出来的种种特殊矛盾与悖论保持敏感,是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理解的前提条件。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使矛盾获得统一,使悖论成为可理解的事实呢?上述列举的几个现象,按其领域分别属于社会流动、主观分层、教育获得、社会参与。要想对其进行解释与分

① 卢汉龙:《城市居民社会地位认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7—199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边燕杰、卢汉龙:《改革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上海市民地位观》,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赵延东:《“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2005年第1期。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② 梁晨、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李中清:《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杨东平:《“寒门贵子”研究被媒体断章取义了吗?》,《教育研究与评论》2012年第4期。

③ 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熊易寒:《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社会》2008年第3期。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析,当然需要根据各自分支学科的中层理论梳理其具体机制。然而,上述现象毕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统一背景下发生的,那么这些矛盾与悖论的因果机制背后是否可能存在着一些共通性的因素,其解释进路中是否会有某些共通的路径?

第二节 追溯变迁的结构动因

本研究的基本预设就是,要想理解人们的生活机遇格局与身份认同意识中的上述悖论与谜题,就不仅要从事体层面的因素上寻找原因,还必须要从结构系统层面寻找原因。

前面列举的种种特殊矛盾与悖论,都是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展现出来的。但是,有必要区分两种改变,一种改变发生在某一系统之内,而系统本身维持不变;另一种改变则是在发生时改变了系统本身。有研究者将前者称为“第一序改变”,将后者称为“第二序改变”。^① 只是从第一序改变的观点提出的解释,是无法用来解释第二序改变的,在这种视角下,第二序改变就是不可预测的、突然的、不合逻辑的,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逻辑层次上。更为重要的是,只从第一序改变的角度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往往因为不得要领而本身又衍生出新的问题(例如对酗酒进行简单的限制,可能不仅无助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反而会衍生出新问题)。^② 与此类似,在研究社会变迁时,我们同样可以区分出两类变迁:一类是社会结构本身是稳定的,但是在既定的稳定结构下,社会结构的构成部分在发生着变化(change);另一类是不仅社会结构的构成部分在变化,而且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与联系也发生变动,即整体社会结构本身也面临着转型(transformation)。社会转型发生的层次

① 瓦茨拉维克、威克兰德、菲什:《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夏林清、郑村棋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同上书,第30—35页。

是高于其构成部分变化的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既包括前者，也包括后者。借助于“变化”与“转型”这一概念区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进程中结构性张力的来源，洞察问题发生的真正症结所在，而不至于形成逻辑层次的误置。

区分“变动”与“转型”，还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的研究框架进行反思，对于其背后的预设保持自觉。本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认为西方的社会学研究路数是有许多隐而不现的假设的，只有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方法路径才有其正当性。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假设前提可以起到简化问题、增强分析效力的作用。但是当时空背景转移时，这些隐而不现的假设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和忘却，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也往往因此而失去。正如叶启政所言：“尝试挖掘存在于西方社会学论述（特别是理论论述）背后的基本存在预设与认识论，应当是我们学习和理解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必要功夫。否则的话，我们会很容易被西方社会学家长期经营下来之厚重且组织严密、传承悠久的历史体系所慑服，以至于我们总是毫无警觉地以他们所提供的概念和设立下的命题作为依据，而依样画葫芦地做起学问来。”^①即使同样是社会变迁，西方的社会变迁研究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研究可能针对的是不同层面，变迁的基本框架可能完全不同，这是中国研究者必须要留心的。

结合本书的基本分析，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西方社会学的诸多中层理论都是在结构基本稳定的社会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即使在研究变迁时，他们研究的也是基本结构稳定前提下，构成部分或局部关系的变迁。在研究主观地位认同、社会流动结构、教育机会获取、社会参与行为等的变迁时，我们往往会将欧美各国视为默认的参照系，进行横向比较。此外，社会学研究中援引的多数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也多数来自欧美对自身社会的经验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时空背景可能使

^① 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得同一现象的主导动因有所不同。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社会,中国在过去30余年间经历了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关系经历了深刻调整。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对于上述领域的研究更可能关注个体差异,更可能关注到稳定的结构化要素;但是中国社会过去30余年经历的深刻社会转型,还使得我们更可能观察到这些领域中的主导动因是结构化的变迁力量,更可能关注到结构性的流变趋势。不同的解释路数与不同的社会实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这并不是说在解释具体的社会事实时,整体结构因素一定优先于局部或个体性因素。整体结构因素与个体性因素,两者中哪一种在解释中更为重要,这个问题是没有唯一答案的。两者的相对重要性,皆取决于具体问题发生的具体环境。^①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实例有助于对此进行阐释。“假如我们想评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相对影响,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基因库和一个固定的历史环境中得到有意义的答案。如果一些儿童成长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另一些则成长于贫困的家庭,那么他们之间在人格上存在的差异,大部分都可以用环境来解释,遗传的作用则相对较小。反之,如果大多数儿童都是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长大的,那么遗传因素几乎就可以解释他们之间存在的全部差异。这些答案所陈述的重要性并非原则上的。……所有有关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有意义讨论,都离不开问题发生的具体环境。”^②在稳定结构的社会系统下生长出来的解释,自然会将注意力放在个体性因素上,因为个体性因素构成这种社会背景中的最大变异;而在变动结构的社会系统上生长出来的解释,自然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结构转型

① 社会科学中长久以来存在着关于知识的“情境性”(situated knowledge)与“普适性”(transcendent knowledge)的争论。Abbott, Andrew, 2004, *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Norton.

② 阿肯:《回归的解释与应用》,沈崇麟、高勇译,《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6期。

上来,因为这种社会背景中的最大变异正来自结构本身。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社会学命题:社会解释本身是用来理解和应对其解释对象与社会问题的,由此也同时被其解释对象所塑造。社会解释与其解释对象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相形塑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影响。

如果不能将这些结构性的流变趋势考虑起来,就无法理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悖论”。例如,为什么在人们的客观地位要素(收入、教育、职业地位)的分布结构没有出现大幅变动的同时,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却可能会出现相当尺度的调整。传统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总结为“谁得到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何种背景和情境下得到”的问题。人们所获得的客观地位要素相同,但是处于不同的背景和情境之中,就完全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主观地位认知。因此,我们在近处迷惑于个体身上的行动悖论时,不妨退远一些,看到更大范围的背景和情境变动,就会更能够理解,或许改变的并不是行动者,而是他身处其中的结构背景。这种结构背景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虽然程度有轻重之别,但是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会感到这种背景转换带来的影响。人们不仅仅受到直接作用于自身的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他人的影响,还会受到作为行动的整体参照系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关注结构动因,绝对不是用简单线性的趋势来代替细致复杂的思考。政治、经济、社会等诸种因素间存在着彼此关联性,它们的变动又受到历史路径的限制约束,因此必须去关注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与情境约束,才能真正把握变迁背后的结构动因。例如,研究者往往会猜想市场经济的引入必然会使得代际流动更为开放,或者使得代际流动更为僵化更为困难。但是,市场经济的引入既

^① 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可能使得代际流动更为开放,也可能使得它更为困难;可能在某些方面的流动变得开放,另一些方面的流动变得困难。结果如何,取决于这一社会过程中的诸多情境因素。只有深入这一过程内部,才能深化我们对于背后结构动因的理解。

因此,本书的总体旨趣就是,根据所获取的调查数据资料,在结构论的理论偏好指引下,对于主观地位认同、社会流动结构、教育机会获取、社会参与行为几个具体领域进行较为详尽的描述与推衍,努力寻找这些变迁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必须对于某些中层理论背后的预设进行反思,否则往往就会忽略真正的结构推动力而只是聚焦于某种局部或个体性的因素。这一总体旨趣是所有具体分析中共有的主题和关怀,它贯穿于各个分析过程与研究问题之中,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中彼此呼应、韵律暗合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内容

与前述思路相对应,本书的内容主要涵盖社会流动结构、主观地位认同、教育机会获取、社会参与行为几个领域,它们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支撑条件。

第二章介绍了用以指导研究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讨论。结构论与个体论,源自社会科学研究中在本体论层面上进行的不同假设,大可不必把结构论与个体论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范式,而可以将两者之间的张力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本书的探索方向是在已经被视为具有结构化倾向的研究路径上进一步向结构化的方向推进。同时,本书的基本研究手段是基于分析目标对数据中的变量关系进行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和推衍,通过数据中显现的内在模式揭示行动者背后的可能结构性动因。本研究中力图保持对于数据中各种矛盾与悖论的敏感,从中不断地挖掘各种“不一致”与“矛盾”之处,借此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

第三章通过数据分析揭示了社会流动格局中的一种变化：社会樊篱的流动。以往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关心的问题是社会流动格局是变得更为开放还是更为封闭。然而这一章的分析却显示出，某一些社会樊篱（管理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樊篱）在变得开放松动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樊篱（精英层与非精英层的樊篱）却在被编织与强化。不同类型的社会樊篱，其疏密程度的变化方向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与精英群体形成吸纳机制、阶层价值观变迁有着重要关系。原本存在的管理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的二元路径逐渐并轨，两种精英出现了融合；精英与非精英群体之间的流动路径却在缩减，出现了更为清晰的分野。上述流动格局的变化，与各个群体在结构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市场机遇”有密切关系。这种社会流动格局一旦形成，就会对之后的诸多社会进程形成约束。

第四章讨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地位层级认同的形成逻辑。地位层级认同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是，虽然人们的客观地位要素（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级）都在不断提高，但地位层级认同发生了整体性的下移。如何认识客观地位要素与主观地位认同之间的联结机制，在此就成为解释的关键所在。该章的分析表明，客观地位要素的提高与主观地位认同的下降看似矛盾，但只要看到利益关系市场化已经使得地位层级认同的“参照系”发生了本质改变，就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逻辑上的有机联系。对于“参照系”转变的强调比“相对剥夺论”等视角更具有结构意蕴，对整体性的地位层级认同变化更具解释力。据此，要想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建立起新的地位“中层认同”，除了进一步提升个体收入外，还需要构建起个体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归属感和认同，并逐渐将地位认同的基础再次扎根于此。

第五章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议题：教育获得问题。该章的数据分析同样揭示了教育获得差异在不同阶段的

升学决策中表现了不同的趋势:义务教育阶段的户籍差异不断降低的同时,初中升高中的户籍差异持续存在,而高中升大学的户籍差异不断拉大。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教育获得的户籍差异并未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而是走势各不相同。面对这一有些矛盾的图景,分析者转而对于模型中所使用变量的意蕴进行反思,认为与户籍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意蕴有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上学决策中,户籍主要意味着家庭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因此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公共资源分配的调整、上学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降低,这种户籍差异就会逐渐缩小。在初中升高中阶段,户籍除了其家庭资源差异外,更多地意味着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定与发展期望,因此更难以随教育的普遍扩展而消除。在高中升大学阶段,户籍更加意味着对于社会机会的竞争过程中差异性的制度设置与权力关系。如果社会身份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学校的制度设置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学校制度设置乃至价值取向都已经不能再独立于甚至日益附属于社会层级差异之时,那么升学概率差异的不断加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了。

第六章探讨了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很多利用个体数据来讨论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的研究,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结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却有相悖之处,人们往往对于参与绩效抱有负面看法。该章的讨论正是力图解释这种相悖之处。在分析中,我们首先辨析了两种不同的参与驱动机制:吸纳式参与和关切式参与。前者以吸纳积极分子、动员现有的高政府信任者为特征;后者以参与者的公共关切驱动为特征,参与者未必对政府持有高信任态度。在个体层面的数据分析中,两种驱动机制可能都会呈现出政府信任与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公共关切的逻辑下,参与行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政府绩效,从而促进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故而两者呈现相关关系。在吸纳动员的逻辑下,那些能够和易于被政府吸纳动员的行动者一般而言都是“政府信任”度

较高者，故而两者也具有相关关系。因此看似相同的相关模式背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内在动力机制。该章提出，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引入个体与集体两个分析层次，用多层次分析方法揭示这两种参与驱动机制的差异。在城市这个分析层面上，关切式参与率高的城市所得到的信任度也更高；但是吸纳式参与活动却并不能提升城市的整体运行绩效，因此参与率高的城市得到的整体信任度未必能高于那些参与率低的城市。

第七章是在前述基础上进行的一个综合性尝试，试图通过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归属、社会信任四个维度来构建社会可持续性指数。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发展进程中社会张力的主要方面。在发展实践当中致力于发展的行动本身却造成了成果分配的公平程度不被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社会冲突和权益矛盾迅速增加、种种社会归属群体分崩离析、社会信任度被普遍瓦解，此种情况并不鲜见。如同发展实践当中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样，上述因素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对发展实践的条件制约，因此有必要在一个统一指数框架下对其进行测量。

第八章进一步对结构与行动、结构与民情、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几对关系进行了反思和讨论。社会结构重建的同时也是个体身份认知与观念的建构和改造，结构论的思想对于理解个体的社会行动的境情性与反身性特征提供了诸多启发。此外，我们可以借助结构分析展示出来的社会图景，揭示其背后“社会民情的复调旋律”；结构分析揭示出来的种种张力与悖论，都与种种观念或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立足与生长过程息息相关。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结构与能动、结构与机制的关联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